

第二章 朝秦暮楚，明争暗斗 各派军阀

乱世出英雄，也出枭雄。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兄弟”反目，祸起萧墙，变生肘腋，你争我夺，群魔乱舞，彼此打得不可开交，一向工于心计的阎锡山当然耐不住寂寞，时时想着乱中取利。但在与各派军阀的交往中，他并非“一条路走到黑”的莽汉，而是朝秦暮楚，见风使舵。阎锡山所信奉的惟一真理便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走出山西一隅之地，最大限度扩充底盘，这就是他的真正目的。

36

一 见风使舵，勾结段祺瑞内幕

黎元洪任总统之际，企图利用他人取代阎锡山主山西军政大权。此事被段祺瑞秘密透露给阎，阎潜回山西，黎计划失败。从此，阎恨黎入骨。在府院之争中，阎总是支持段祺瑞。本文作者系阎锡山之亲信，炮兵负责人，这里着重介绍了阎响应段祺瑞“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发兵湖南，最后全军覆没。

联段倒洪

1916年7月间，黎元洪听信孔庚、黄国梁对阎锡山的控诉；加以他左右四大金刚的怂恿，就决心用调虎离山的手段撤换阎锡山而代之以孔、黄，以稳固他的总统地位。段祺瑞先得到这消息，秘密地透露给了阎锡山，黎的计划才落了空。这件事，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外间人很少知道，因为阎当时曾嘱我们严守秘密，以免外人“大惊小怪”。现在追述出来，供研究史学的参考。

阎锡山常向我们说，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京谒见袁世凯，不知不觉就汗流浹背，俯伏在地，行了个跪拜大礼。尽管他对袁世凯五体投地，因袁世凯对于与同盟会有瓜葛的各省都督，都一律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所以对阎锡山也不例外。但是阎锡山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保持他的山西都督（后来改称将军）的位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袁世凯极力逢迎，博得了袁大总统的欢心，而更主要的是段祺瑞对于阎锡山曲予维护，尽量在袁世凯面前帮他讲话的缘故。

为什么段祺瑞会对阎锡山这样帮忙呢？段祺瑞从小站练兵时起，给袁世凯办了若干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袁世凯当了总统，便委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最感到得意的是：全国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故吏。“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段祺瑞既然好为人师，阎锡山便投其所好，在他进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首先具了门生的帖子，拜见段祺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在谈话中间，一口一个老师，极尽恭维之能事。这样一来，段祺瑞便在袁世凯面前力保阎锡山，说阎虽然参加过同盟会，但是绝对靠得住。袁世凯见了阎锡山之后，也称许他“脑后有反骨”，对阎锡山的戒备便放松了。

另外，阎锡山也很懂得怎样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在袁世凯执政时期，阎锡山对于军政大事，一概不闻不问。政治，有袁世凯派来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炎主持；军事则一古脑儿交给了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自己做到了无为而治。不仅如此，每逢袁世凯有什么措施，阎锡山总是首先拥护。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时候，阎锡山也是首先劝进的封疆大吏之一。因此，袁世凯才龙心大悦，给予了一等男的封赠。

山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和阎锡山是山西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并曾结拜为盟兄弟。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拜山西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的父亲陆军部侍郎姚锡光为老师。姚锡光赏识他少年老成，写信给姚鸿法，很加誉扬。姚鸿法便对阎锡山另眼看待，大为倚重。阎锡山先把黄国梁推荐给姚，使黄当上了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的标统。这时阎锡山却只担任一个督练官和陆军小学堂的教官。直到八十六标标统夏学津因“交文案”被迫离职，阎锡山自己才当上了八十六标标统。

黄国梁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极为爽直，什么事情都说一不二。阎锡山对他有什么指示，能办到，他就办，不能办，他就一口回绝说“不行”。因此阎锡山曾向我说：“黄绍斋（黄国梁字）这个人，只有他对我下命令，却从来不接受我的命令；他有多少事对不起我，我总对得起他。”在当时山西的军人，背地里都称黄国梁为天主。因此，两人也有些面和心不和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阎锡山和山西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阎锡山自己。他认为袁世凯一死，自己再没有畏惧的人了，便改变了他过去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假装睡大觉的作法，准备“发奋称雄，励精图治”起来，想把山西省军政大权都集中

在个人手里，为所欲为。由于金永炎成立警备队，有 30 多个营，杀害了革命党和无辜百姓多人，怨声载道。阎锡山派我带人去抓他。他闻得风声，化装逃走了。

阎锡山心愿还没有实现，已经有他的仇人企图利用袁死黎继这个巨大变化，对阎锡山动手了。其中一个就是孔庚。

孔庚原是吴禄贞的中校参谋，燕晋联军失败后，投到山西，阎先委为朔方兴讨使，后又委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孔驻在包头时，因为想用日本武上道的精神训练军队，激起兵变，侥幸逃出了一条性命，后来先后调任晋西、晋北镇守使。

孔庚和黎元洪都是湖北人，和黎元洪左右的四大金刚（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也都早有渊源。便在黎元洪面前极力揭发阎锡山的劣迹，决计要把他除掉。据我后来了解，孔庚的计划是与黄国梁里应外合，取阎锡山而代之。黎元洪就秘密派了代表到太原来见黄国梁，并住在黄的公馆里。这一天，我正在阎锡山的办公室里，有人来向阎报告：“听说总统府派了个要人到太原来，住在黄旅长的公馆里。”阎锡山当时不动声色地说：“那有什么关系？由他去吧，你不要多管闲事。”

在袁世凯时代尽量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最后只剩下黄国梁这一旅人了。袁死后，黄国梁准备扩充军备，召集他的秘书、参谋等人拟了一个计划，要把一个旅扩充成为一个师。这个计划订得非常详尽，只剩下把师长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了。计划送到了阎锡山办公室，我又正在那里。阎锡山看过以后，立刻怫然变色，把计划扔在地上，拍着桌子喊道：“绍斋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我作傀儡呢？一点小事，他都不听我的，难道我就那么听话！”说罢，二话不说，就叫人把秘书长贾景德找来，拟了一个电报，拍发给北京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国务总理，大意是黄国梁如何跋扈，不服

节制之类。电报拍发之后，阎锡山还不解气，立刻把宪兵司令张达三找来，交给他一道手谕，立刻执行。手谕上写的是：“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并当面吩咐张达三，一定要监视黄国梁明天早车离太原，并不得与军官们见面。

这位宪兵司令在黄国梁当权时期，是趋奉黄国梁最厉害的一个，现在黄的大势已去，自然要严格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了，立即派出宪兵一连，把黄国梁的公馆监视起来，限制旅部的官兵和黄见面。在这种重大压力之下，黄国梁便在第二天一早乘坐火车离开太原到北京去了。

那天早晨到车站去送黄国梁的，只有我一个人。宪兵司令张达三只派了一个连长在那里“监视”，本人也没有露面。黄国梁见了我，感慨地说：“子梁，难得你来送我，你不怕阎百川误会你么？”我淡淡地说：“那有什么？”黄国梁说：“我倒并不留恋什么旅长的位置，他要我离开，很可以预先向我说明白，我也不会不同意，何必像这样押解出境似的，逼人太甚呢？！”我说：“韩信曾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就自嘲似地说：“我这次到北京去，别的没有什么，只是遇见了温静安（温寿泉字），他若向我说一声：‘怎么，绍斋，你也来了！’我却真有点难为情呢！”原来山西军政司长温寿泉和阎、黄二人都是同学，温寿泉离开山西，是阎锡山授意黄国梁逼走的，不料今天却轮到他自己，难怪他有这番感慨了。不容我再出言慰解，汽笛已经长鸣，我只好匆忙作别，下了火车，看他抑郁寡欢地离开了太原。

我回到家里，就接着阎锡山的电话，叫我即刻到督军衙门去。我想，一定是有人向他报告，我去送了黄国梁，所以特地找我。这番见他，少不得要大加申斥一番了。我硬着头皮到了督军公署，阎锡山倒是提到了黄国梁，他说：“听说，你还到车站去

送他。我看，大可不必！”却没有再往下说什么。接着就和我研究黄国梁这一旅的人事问题，分析在黄走后，可能发生哪些问题。我满口承担说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军官学校一期同学占大多数。

黄国梁离开了太原，孔庚的里应外合计划，当然遭到了失败。

7月间，阎锡山接到黎元洪的电报，邀他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他带着赵戴文、张树帜、陈效愚和我一共四个人，来到北京，照例住在大同寓。

这一天，他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肯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第二天晚上，段祺瑞突然派了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到了府学胡同段祺瑞公馆里，去了很久，他才回来。我们看他神色很不平常，心想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却又不好问他。呆了一会，他才哼了一声说：“黎元洪这小子要端咱们的锅呀！”随后，他才把段祺瑞泄露给他的一段内幕，向我们述说了一遍。

原来黄国梁被撤职以后，孔庚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但仍不肯死心，就再三鼓动黎元洪，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阎锡山调到了北京，然后准备秘密派遣孔庚、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只要他们一到太原，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这时阎锡山正在北京，要想反对也就措手不及了。

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问道回转太原。只要阎锡山一回到太原，黎元洪就不敢冒昧动手了。段祺瑞替阎

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到新乡，换坐道清铁路的车到清化，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

阎锡山说到这里，就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宣布说：“我想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回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我决定明大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不过我从车站上车，难免引起他们的注意。”阎锡山一边说，一边取出了400块大洋交给我和陈效愚说：“你们两人明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等人疏通好，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尽量开慢车，让我能够设法上了车。只要我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走了以后，你们4个人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我，就推说我病了，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我的病，你们就可以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要想尽方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到接着我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

最后，阎锡山还说：“孔庚、黄国梁真不是东西，差点端了咱们的锅。黎元洪更不应该，为什么想出这种阴谋诡计来暗算我！”

说罢，我们就纷纷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照计而行。我和陈效愚两人先到车站，头一关去找扬旗工人，我先给了200元大洋，他慨然答应了。再去找这次列车的司机，他也连连答应，把200块现洋随手接过，放在车头里边，连添煤的助手，都不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把戏。事情办妥，我和陈效愚还替阎锡山准备了一张二等车票，便到车站外面来迎阎锡山。不久，就看见阎锡山坐着洋车来到车站，浑身商人打扮，穿了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檐压到眉头，还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我们二人把他领到车

站水关以外扬旗地方，就悄悄站在那里。等火车开到这里，果然扬旗手连举红旗，挥个不停，司机员把头伸到车外，向我们频频示意。直到我们把阎锡山推上车去，向司机和扬旗手分别打了招呼，车才加紧马力，一直向前开出。

两大以后，我们接着阎锡山从太原打来的电报，便依照他所嘱咐的话，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开北京回转太原。在动身以前，赵戴文还到府学胡同段公馆跑了一趟，面告段祺瑞：阎督军已经遵照他的指示回到太原了。

阎锡山回到太原以后，孔庚等人的计划当然落了空。不过，阎锡山却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黎元洪身上，深恨黎元洪不该充当孔庚等人的工具。所以后来府院之争，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祺瑞这一边，而且还派了个得力代表到安徽和倪嗣冲、张勋等人接洽。在督军团倒黎的运动中，阎锡山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闯将，可是却在背后煽动蛊惑。最后，黎元洪终于被督军团挤得无路可走，把张勋搬请进京，演了一出复辟丑剧，黎元洪也就垮台了。这时，阎锡山才吐出了这口怨气。

由于阎锡山和段祺瑞有这一番不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所以在几次军阀混战中，阎锡山总是公开或暗地支持段祺瑞。他经常向我们说：“段先生正派，做事肯负责，是个爱国的军人。”

出 晋 远 征

黎的计划失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稳定下来了，加以他的老师段祺瑞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给阎以大力支持，阎锡山便准备扩编军队，充实力量。山西兵力原来只有一个混成旅，现在扩充为四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为商震；第二旅旅长为马开崧；第三旅旅长为孔繁蔚；第四旅旅长为赵戴文，辖四个团，实际上是阎锡山管辖。我的炮兵也由1个营

扩充为4个营。这时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日趋尖锐。阎锡山一方面积极参与督军团的活动，处处与黎元洪难堪，一方面还密电段祺瑞，报告他山西兵力比以前加多了，如有使用兵力的地方，山西军队愿为前驱。段祺瑞复电，大为嘉奖说：“现在还不需要，一旦用兵，一定去电征调，希望努力训练队伍，以备不时之需。”这是1917年春天的事。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也引咎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主张对南北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而段祺瑞则坚持讨伐“护法运动”，用武力统一中国。府院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阎锡山还是积极支持段祺瑞的。我不甚明白阎、段之间的新的内幕，曾经向阎锡山谈到我个人的看法说：“段先生离开政治，想只用武力来统一南方，恐怕这种作法会引起内部的分裂，我有点替他担心。”阎锡山听罢，微微一笑说：“你只会练兵，只会打仗，只会走直线，还懂得什么政治？可笑可喜！得了，不用分心啦，好好地练你的兵去吧。”

1917年9月初，段祺瑞突然来电报给阎锡山，大意是：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独立，与桂军勾结，企图倒傅良佐。命令山西派一个混成旅到湖南援助傅良佐。

44 阎锡山早已屡次向段祺瑞表示，愿以山西的武力作为段的后盾。现在接到段的电报，正是效忠于老师的大好机会，立刻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谋长、军务处长、四个旅长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阎锡山首先说明情况并征求大家意见。可没有等大家表示意见，他就自己作出结论说：“依我看，启予（商震字）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样？”大家没有反对。阎又向我说：“子梁（我的字）你也带上一营炮兵，和启予一同去。”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第一混成旅共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蔡荣寿，第二团团长王嗣昌，全体出

动；再带一营炮兵，由我带领。不过不用带炮，只带人伏骡马，因为湖南多山，炮行动不便，要用人抬；而且湖南方面有五生的七的小钢炮，可以供我们使用。

会后，阎锡山先约商震去单独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接着，又把我找去说：“方才我和启予谈了一下，他的勇气十足，信心很强，这当然很好。我知道他，因为他来山西不久，很想多立几场功劳，表现自己的能力。今年夏天郭坚来窜山西抢地盘，启予卖的力气最大，这一次叫他到湖南，出省远征，他的劲头就更足了。他认为这正是他出头露面的好机会。不过，一个人要好的心太切，有时也会误事。湖南离山西这么远，应当看事行事。你这一次随着启予同去，要临机应变，随处留心，不要凭着启予一个人的高兴，闹得尸山血海，把咱们的人都打完了。”

山西省的队伍，远征到几千里以外的湖南，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路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从大智门车站过江使用民船。人员还好，炮兵因为有几百头骡马，费劲不小。有些骡子掉在江里，幸而沿岸水不深，想尽办法才拽了上来。我在旁边指挥照料，等到我带着炮兵过了江，商震的旅司令部已经带着第二团作为第一批乘坐火车向长沙出发了。炮兵在中间，最后是第一团。我到长沙的时候，只会见商震和旅参谋长郑逸明以及旅部的人员。第二团不等全旅集中，就已经开到前线永丰去了。

诚如阎锡山所说，在带队出发的时候，商震的劲头就十足，在长沙会见了傅良佐以后，他的劲头就更足到十二分。他一见我就满面春风地说：“傅清节（傅良佐字）可真够朋友，对咱们十分客气。他说，他早知道山西军队训练有素，作战能力很强。咱们的队伍一到，湖南就稳如泰山了。他还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永

丰，只要永丰不被南军占去，就可以保住湖南。咱们这次应当好好地卖一手，也让老总在段先生面前露露脸！”从他的口气中，不难想到，傅良佐一定给商震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可是我不愿意说破，也没有把临行时阎锡山向我嘱咐的话，向他透露。由于第二团已经开拔，我们在长沙也不能稍事休息。等炮兵向傅良佐处领到了五生的七的小钢炮和抬炮的民夫，我就带着炮兵随同商震的旅司令部向湖南西南的永丰前线挺进。

由长沙到永丰，经过湘潭、湘阴。我们开到永丰时，永丰城还没有丢，王嗣昌在永丰西南占了阵地，已经与桂军对峙作战整整一天了。对面的敌军据说是广西军马济、韦永昌的队伍。

商震在永丰城里找了一所大宅院，设下了旅司令部。他在城内布置，我就带着炮兵出城来到了阵地。

我一到阵地，二团第三营营长杨爱源就匆匆跑来说：“你来了，好极了！快把炮架起来，打吧。”我说：“我刚领到的小钢炮，还没有试过，炮弹适用不适用，我还没有谱呢。”杨爱源说：“管他三七二十一，来一家伙吧。”于是我就吩咐开炮，向正面敌人猛打。广西队伍没有炮，装备也差。我的炮打过去，对面的攻势就挫下去了。

我们在阵地上迎击了两三天，第一团的队伍才开到，加在左翼，和杨爱源的队伍相连接。蔡荣寿这个人很狡猾，他的阵地在杨爱源部的后面有三里地的距离，并不在一线上。

马济、韦永昌的队伍，忽左忽右，总想突破我们队伍薄弱的环节，可是尽管他们吹着牛角号冲锋，但是一直没有攻破我们阵线。

相持了四五天，敌人看我们守得很严密，无懈可击，攻势就逐渐放松，呈现了胶着状态。

我看战地已经稳住，就想进城到旅部看看情况。同时，我还

有一个个人目的：这几天天天吃米饭，我很不习惯，想到旅部去吃点面食。

全军覆没

我刚到旅部，商震忙叫副官给我煮挂面。可是，我刚端起碗吃了两口，突然就听到哒哒的枪声大作；就和旧历年节放的鞭炮一样；同时，枪弹刷刷地向我们的房内射来。我和商震都在窗户台底下找个隐蔽地方躲了一大阵。等到枪声略稀，商震帽子都顾不得戴，军大衣挂在墙上也来不及穿，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就猫着腰一同向后院走去。这时商震的参谋长郑逸明也跟我们一同跑了出来。走到后院院墙，我和商震都翻身跳出，郑逸明是速成学堂学生，没有经过充分锻炼，身子又胖又笨，墙高的地方他爬不上去，就找了一块短墙，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爬过，用尽平生气力，向外一跳，不料墙外是老百姓菜园沤肥的粪窖，恰好掉到了粪窖里，闹得大家哭笑不得。接着我们就向西南方向跑出了城。喘息方定，便把蔡、王两个团长找到炮兵阵地开会。这时，有商震的几个马弁跑来了，说：“湖南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的队伍，驻在咱们旅部对面。他们和南军联络上了，向咱们的旅部开枪，把咱们一排卫兵缴了械，现在枪声已经不密了，可是还在打呢！”

我说：“我带着1连小钢炮，配合上二团二营李培基的预备队，把朱泽黄打跑了再说。”

商震犹犹豫豫地说：“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兵力，那一旅人也不知道在哪里，态度怎样，情况还没有摸清呢。”

王嗣昌说：“不把他打走，咱们怎么去城里住？他一兵变，咱们就没有后路了。”

商震想了一想，说：“好吧。我和你们一块去。”于是商震和

我带着李培基的预备队，还有一连炮兵，一同进了城。走到旅部附近，向朱旅一开炮，朱旅的人全跑了，不知去向。于是城里的变兵全肃清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什么损失，又把队伍带回阵地。

马济、韦永昌看我们防守严密，攻不动，就不再猛攻。一连几天，只有些小接触。后来，广西谭浩明又加上了一股队伍，战事才又激烈起来。商震连忙向长沙打电话，傅良佐在电话中说：“已派阎旅牛团出发，即刻可到。”我们官兵一连坚守了10几天，士气已经逐渐衰落下去，现在听说援兵即可到，就又振奋起来。

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三天多，还没见援军来到。我就去找王嗣昌说：“世卿（王嗣昌字），援军说即可到，三四天还不见来。是不是内中有什么变化？”王说：“你打算咋办？”我说：“咱们找启予吧。”我们二人一同进城，找到商震说：“咱们的队伍顶了10几天，连营长们都叫唤上了，援军还不见来。怎么办？”商震没有说什么，可是脸上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两人也不好说什么，就又回到阵地。呆了不过三四个钟头，传来了旅部的日日命令簿，上面写着：

“本军奉令死守永丰阵地，如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

48

我看罢，向王嗣昌说：“启予这是给咱们钉子碰呢。”王嗣昌说：“没关系，顶着干吧。”

又过了几天，杨爱源沉不住气了，向我说：“天天说，牛团即可到。可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牛车，也早该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再去找找启予吧。”我说：“我不能找了，再去，要我的脑袋了。”杨爱源说：“咱们两个相跟着找团长去。”我俩一同找着王嗣昌。王说：“我在阵地不远的一个绅士家里抽大烟，听说王汝贤、范国璋这两个人已经打出电报主张停战言和了。也不知道确不确。”

杨爱源说：“这与咱有啥关系？”

我说：“傻子，关系太大了。王汝贤、范国璋是北京政府派来援湘的总副司令，他们停了战，咱们不是也好了么？”

我们扯了一阵，也没有结论。这中间我曾碰见商震。他说：“我派在长沙的留守司令丁鸿谋来电话说，长沙情况很好。我和督军公署打电话，傅清节的副官也说，援军早已出发，就快到了。咱们只有坚持等待援军。”

过了几天，王崧昌又向我说：“我在绅士家里听说，自从王汝贤、范国璋发出通电以后，逼得傅良佐离开长沙逃走了。谭浩明已经从衡阳、湘潭到了长沙。衡阳一带驻有北军两个师，谭浩明经过时，也没有打。我想：哪会有这种事，一定是谣言。”

我大吃一惊说：“这还了得，找启予去。”我们两人一同来见商震，把上项传闻的消息一说。商震也着急了，连忙打电话找丁鸿谋说话，丁鸿谋也不知去向了。留守处有一个人接电话说：“傅良佐走了10几天了，临走时留下一个副官，傅说：只要永丰前线来电话就说牛团即可到，现在这个副官也不见了。”

商震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傅良佐一个大当。当着我们似乎很难为情，莫可奈何地说：“咱们也往后撤吧。”决定当夜撤兵。

这天夜里我们按计划悄悄往后撤。马、韦的队伍也没有追击。从永丰撤到了湘乡，在曾国藩的祠堂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放明，商震就让再往前走。全旅人马就以急行军的姿态往湘潭前进。离开湘乡时，我因钢炮携带不便，都沿途扔下了。

我们走得很急，一路上还不断遇见老百姓成群结队拿着铁锹、刀、矛之类拦截我们的去路，少不得还要和他们周旋一番。下半天5点左右走到了湘潭城外。湘潭是水旱码头，人烟稠密，市面相当热闹，士兵因为一天没吃饭，枪也没架，就向官长请求进城。我说：“不敢进城。王世卿的话要是真的，湘潭城还不早

被敌人占了，还是在城外山上宿营比较妥当。”蔡荣寿极力主张进城。营长们也都说：“一天没吃一点饭，士兵们都饿成这样子了。咱们进趟城，不用住下，买点吃的，让他们吃饱了，再出城，好好休息一夜，明天也好继续前进。”王嗣昌在旁一语不发。他平时就不大爱说话，这次的谣言是他听到的，他也不辨真假，就更不好插嘴了。商量半天，还是主张进城的居多。我说：“你们进城，我可不去。”于是，全旅的人都随着商震进城了，只有我带着几百名炮兵在城外一个山上小村子里住下，拿出些大米，叫老乡给我们煮饭。饭还没有煮熟，就听见城里面枪声大起。我一听，就知道商震他们准是遇上伏兵了。连忙把饭拿来，不顾生熟，就胡乱吃了下去，一面吃饭，一面派了个人到城门口打听消息。这个人不久就喘吁吁跑回来说：“四面城门都紧闭了！”我想：“关起门来打，好比瓮中捉鳖一样，这还有个跑！”也顾不得商震他们了，连夜带着我这几百名炮兵，向长沙前进。这时我们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样，慌忙往前逃命。

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七八点钟光景，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易家湾。我们正预备稍微喘口气，喝口水，便遇见了一支队伍，人数不过一连，却枪械齐全。遇见我们，便托起枪来，向我们做出预备放的姿势。其中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军刀，不问青红皂白，就恶狠狠地迎头向我劈来。我看刀光闪闪，已逼近我的眼前，无路可走，只有把两眼一闭，准备在他的刀下作鬼。说时迟那时快，还未容那人的军刀劈下来，就听见一个人大声喊道：“都是熟人，不要动手！”我一听声音很熟，睁眼一看，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他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明笑嘻嘻地向我说：“子梁学长，受惊了！”我一见是唐生明，不禁暗自道声惭愧，大概我又有活命了。便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现在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湖南的军队现在都变

了，你们不是要往长沙么？也不必去了。还是奔岳阳吧。王金镜的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在岳阳，还是到那里去好些。”我这时惊魂甫定，如醉如痴，也不知道应当向他说些什么。还是唐生明念在同学的情谊，替我考虑得相当周密。他想了一下说：“我可以送你坐外国邮船到岳阳去。不过，只限你一个人，还得请你把手枪交给我。你的部下我可以替你雇民船绕道湘江，送到岳阳。不知你以为怎样？”我连连称谢，顺手就把手枪取出交给了他。我的秘书、军需也要求随我同坐邮船，唐生明摇头表示不能办到。于是我一个人被唐生明派人送上了邮船。邮船停泊在湘江时间很长，我在船上远远看见我的部下坐上了民船，一桨一桨地款款向前开去。一直到中午以后，邮船才开出湘江，向北前进。

我安然到达了岳阳，进城找到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去看王金镜。王金镜一见我似乎十分意外，咦了一声说：“你怎么回来了？”我就把上项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他说：“我已经得到了报告，你们的队伍在湘潭被南军俘虏了，听说正向武冈送呢。你们这一次大概全军覆没了，我给你一点钱，你先在岳阳住下来，收容你们的流散队伍吧。”

我在岳阳找了一家客店，叫做悦来店。我到了店里，洗了脸，吃了饭，便给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当晚又发了封长信，报告全军覆没的经过。这一天我还写了许多招帖，写明我的住址，在城门和街上冲要的地方，张贴起来，希望我的队伍和路过岳阳的山西部队能到旅店里找我。

我在悦来店住了一个星期，到岳阳前来找我的队伍有几百人，他们一个个衣裳褴褛，满脸风尘，连秘书、军需等人，也如此狼狈。他们说：“唐生明给我们雇了民船，从湘江开出，不过十来里地，就遇见一个卡子。卡子上驻有一连人，大概都是广西队伍，叫我们缴械，我们把枪缴了，一个人也没有伤，都被撵下

了船。本想再坐船，怕又遇上卡子，只好顺着湘江边，徒步走到这里。”后来我们又住了几天，又收容了一些流散的山西士兵，便决意带着队伍回转汉口，再回山西。临行时，又详细地给阎锡山写了封信。

到汉口，住在人和栈，我又写了若干招帖。住有三四天光景，听说商震也到了汉口，住在福昌旅馆。我到福昌旅馆一看，随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军需官宫瑞生。商震见了我当然很高兴，却又似乎很惭愧，不像前些时那样器宇轩昂了。据他说，他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带着队伍进了湘潭城，不料中了敌人伏兵之计。敌人预计我们队伍必从湘潭经过，就在城里楼上楼下四面埋伏。我们军队一进城，便将四门紧闭，放起枪来，还有人高嚷：“缴械不杀！”大家措手不及，也没有抵抗，就都缴了械，老老实实作了俘虏。随后集中起来被送到武冈，押在当地的青年会里。由于商震会说英文，先和青年会的执事人搞熟了，随后又认识了会里的外国人，关系搞得很不错。商震就要求外国人设法营救。外国人开始答应把他一个人悄悄放回。因为款项都在宫瑞生身上，商震就要求把宫一同放出，随后再找机会把几个重要军官也陆续放回来，外国人一一答应了。这一天夜间，他们把后门打开，将商、宫二人放了出来。王嗣昌、杨爱源、蔡荣寿、李培基等人，也将陆续来到汉口，因为商震临行时曾和他们约定在汉口会面。

我和商震谈了一会儿。他神态萧索，没有谈起什么时候回太原，我一时也没有和他详细计划，准备等杨爱源等来后再说。我离开福昌旅馆时，宫瑞生悄悄递给我一迭交通银行钞票，我塞在衣袋内就走了。

回到人和栈，我又打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向阎锡山报告。第四天，陈效愚（名增智）就奉阎锡山的委派来到汉口。他找上我

邀商震一同回去。商震当时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只是再三说：“自己带队南征，全军覆没，实在对不住老总。”陈效愚不得要领，就回转太原去了。

不 了 了 之

隔了一天，王嗣昌到了汉口，径自跑到人和栈来找我。他向我谈的经过，和商震说的大致相同。只是他过去和青年会毫无关系，这次很感激青年会的救命之恩，再三向我说：“青年会很有用，咱们回到太原，一定要帮助青年会的事业，大大地发展发展。”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后院人声嘈杂，连喊“救火”，随后还有人大喊“救命”。我向窗外一看，外面已经烟雾弥漫。后院住的都是寄寓在旅馆的流娼，共有一二十人，不知怎么，酿成了火灾。我一看情势不对，忙说：“不好，着火了，快走！”我抢了一件短大衣披上就往外跑，王嗣昌赤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随我一同跑出了旅馆。火势凶猛，眼看着人和栈付之一炬了。我们二人匆匆跑到福昌旅馆，商震看见我们这样狼狈，吓了一跳。忙叫宫瑞生替我们准备两套随身衣服和零星用品。因为福昌旅馆房价高，用度太大，我们就在附近另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杨爱源、李培基也来了。只有蔡荣寿还没有到。

这一天，阎锡山的副官荣鸿胪又来到汉口，他向商震再三说：“老总说，军家胜败，古之常情。老总叫你们一定要回太原，老总决不怪你们。”商震当面一再表示：“多谢老总。”可是荣鸿胪走后，商震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宫瑞生向我们透露：“湖北督军王占元很赏识商震，想留他在武汉帮忙，而商震因为自己投到山西不久，这次出兵，就打了个大败仗，全军覆没，没有脸再回太原了。大概很想留在王占元这里。”

我听到这个消息，和王嗣昌一商量，便联名给阎锡山拍了一

通急电，说明这些情况。没等荣鸿胪回转太原，阎锡山的副官长李德懋带着一个中校副官又来到了汉口。李德懋向我们传达了阎锡山的意思，表示他是奉命来迎接我们同回山西的。这一来，商震感到情面难却，也无法推诿了，这才同意，一路回转太原。

我们几个人一同从汉口到了石家庄，商震向李德懋说：“请副官长先回去，向老总报告。我们在这里等蔡荣寿来了，一同回去。”李德懋看见商震已经离开汉口，料想不致再有其他情形，便把中校副官留下，他一个人先回太原复命去了。

我们在石家庄又等了两天，蔡荣寿也回来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就乘坐正太路火车回转太原。在太原车站，阎锡山派副官前来迎接，还备有一些马匹，我们几个人都乘上马径奔督军公署，那几百名残兵也有人分别予以安插。

我们到督军公署和阎锡山见面，事前我以为他少不得要申斥



身穿戎装的阎锡山

几句。不料他态度非常安详，从从容容地问了几句话，就说：“你们洗洗脸，吃饭罢。”这一天他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给我们“洗尘”。在酒席中间，阎锡山只和我谈些琐碎家常，提到湖南作战的事，他仅仅一笔带过。他说：“这一次战事，因为段先生和冯总统有矛盾，才发生这样的事。事先我一点不晓

得，累得你们吃了一场苦头。”这几句，便轻轻把我们败战的责任卸去，大家似乎吃了一服安心丸。开始看见满席美酒佳肴，还有些食而不知其味，现在才放下心，饱餐了一顿。我曾问他：“王汝贤、范国璋的电报看到了么？”他说：“看到了。”我说：“我们那里却一点影子也不知道。”我没有再扯下去，他也没有往下谈，接着就又换了话题，谈到山西省近来一些生活上的琐细问题。我们是6点钟到的督军公署，一直到10点左右，阎锡山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们一个个才离开了督军公署。

这一次出征失败后，在山西军界，也引起了一些的变动。蔡荣寿因为作战不力，调到第四旅任第十团团长；杨爱源升任第一团团长；第二团团长仍是王嗣昌。

但自此以后，在山西军政界常说两句讽刺的话；一句是“大将南征胆气豪”，一句是“交枪没有收条”。这是嘲笑这次山西军出省远征的。

(周 玳)

二 阎锡山与直皖奉军阀的勾心斗角

1923年10月10日，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贿选的手段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以后，北方军阀混战的形势又展开了新的局面。

直系军阀吴佩孚，在1920年一仗打败了皖系，1922年又战胜了奉系，自命为“常胜将军”，踌躇满志，妄想凭借武力，统一天下。而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都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积极活动，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也就纵横捭阖，勾结分化，企图各自保持实力并进一步扩张地盘。在这种形势下，割据山西的阎锡山，就成为直、奉、皖三系军阀争夺的主要对象。而阎锡山虽然盘踞山西10余年，但实力究竟薄

弱，如何自保，亦不得不煞费踌躇。当1924年春季以后，直奉二次战争的前夜，各方面派来山西作说客的代表往返频繁，都想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阎锡山拉到自己这一边来。我当时曾奉阎命，与各方面来晋代表周旋应付，并在阎左右参与策划，因而对于阎与吴、段、张勾心斗角的种种事实知之颇详。兹就记忆所及，述之如下。

直系代表顾祥麟的活动

吴佩孚派到山西的代表叫作顾祥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和阎锡山同期，曾在山西作过军事教官和炮兵营营长，因为吸食鸦片，为阎所深恶，被迫辞职。后来他投效吴佩孚，这次即以吴大帅代表的身份来到山西。他一到太原就来见我，叫我代他先容，并请阎指定会见的日期。

我向阎报告了这件事以后，阎当晚就召集赵戴文、杨爱源和我三人共商对策。阎锡山首先向我们分析了当时局势：段祺瑞自从直皖战争以后，一直准备东山再起，皖系的卢永祥盘踞江浙一带，是全国最繁华的地区，又是金融的中心；张作霖败退出关以后，更是积极整顿，加紧练兵，公然在东三省宣布独立，可见他势力雄厚，野心不小。阎认为目前形势紧张，直奉随时可能再行开战。不过，据他判断，如果直奉二次作战，仍然是直系胜利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直系的地盘，包括华北、华中的大部地区，曹锟又拥有“大总统”的尊号。吴佩孚直接可以指挥的军队就不下三四十万，都是久经作战的老北洋军。吴佩孚可以影响的队伍，如陕甘一带，还有若干万人。就兵力而论，吴佩孚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吴佩孚在洛阳练兵三四年，兵比奉军练得精（我记得阎锡山说到这里，曾经很具体地说：“据李服膺报告，奉军练兵还不如咱山西呢。”），而且有英美的大力帮助，给吴成立了

飞机队，又卖给曹锟三万枝步枪、250挺新式机关枪。直系不仅兵精械足，而且在作战的时候，吴又肯于亲身到前线指挥，鼓舞士气。阎锡山说：“根据这些情况，我判断吴要胜。吴胜，可对咱们不利，因为吴这个人，刚愎自用，逼人太甚，在他底下干事，困难得很。奉张胜了，可能拥段上台，对咱们还好一点。”在谈话中间，他还提起了直皖战争的事，既恐重蹈上次的覆辙，更怕吴还不忘上次的仇恨，对他进行报复。

原来1920年7月间，直皖战争发生时，据阎锡山的估计，吴佩孚只是新近成立了两三个师，远不如皖系的兵力雄厚，判断皖系必胜，于是就决心支持皖系，准备出兵石家庄，断吴的后路。不料皖系的军队太不争气，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吴佩孚打败了。当时阎锡山的处境非常尴尬，兵已开到娘子关，幸亏还没开出关去，连忙顺风使船，由讨伐转为慰劳，派张荫梧带50万元到保定去劳军。他认为这些情况，尽管曹锟知道得不清楚，而吴佩孚却是心中雪亮的。由于上次的教训，所以阎锡山现在就特别踌躇起来。

阎发表了他的看法以后，就征求我们的意见。杨爱源是一言不发。赵戴文则极力给吴捧场，认为吴佩孚能文能武，比唐太宗还强，而且为人正派，没有一般军人淫邪的作风，全国人民厌乱思治，都希望吴能统一中国。这一晚谈话时间很长，最后阎锡山决定的态度是：“无论哪方面的代表来了，都不要说太肯定的话。我不表示意见，你们也不要表示。”

然后阎锡山对我谈到了吴佩孚的代表顾祥麟，说：“上次他在山西搞得不很圆满，他对我是不会满意的。不过他对你的交情很厚，你要尽量和他拉紧一点，好叫他在吴子玉面前给咱们说几句好话。他爱抽大烟，你就送他几斤好烟土，多请他吃点好东西。”当时，阎还叫我带给他1000元旅费，让他休息一个时期再

和阎见面。最后阎再三嘱咐：“你多和他拉拢拉拢，敷衍好了之后，可以扭转他对山西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招待所去回看顾祥麟。他还没有起床。我说：“你怎么还不起床？”他打了一个呵欠。我笑笑说：“是不是烟瘾又犯了？”他极力掩饰，我说：“咱们老弟兄，你还瞒我？”他才说：“你算猜对了，招待所里哪能抽烟呢！”我说：“我的家里就现成。”他说：“你不要骗我，你的家里还会有这些东西？”我说：“我是为了招待人，也准备了一份（其实我是听阎的指示，连夜为顾拼凑来的）。”顾非常高兴，连脸都没有洗，就坐车回到我家。等他抽足了烟，我才问起他此次来晋的任务。

顾祥麟很得意地说：“玉帅叫我和老总说，要他赞助玉帅。玉帅说他的兵足够分配，无须老总出兵援助，只要能保护住交通就行。”我就顺便刺探：“玉帅还有什么指示？”他说：“玉帅谈的话不多，秘书长张其铨对我说的话多些。”我连忙问：“他说了些什么呢？”顾祥麟说：“他说阎老西滑得很，你不要上他的当。他越滑，你越要单刀直入。你告诉他头脑要清楚一点，玉帅现在势力多大，老段是个光杆，奉张更是乌合之众。玉帅亲自出马，必胜。你叫他意志坚定一点，不要三心二意。”

当天我把这些话又一一向阎报告，阎说：“张其铨这个人可真了不起，怪不得人称小诸葛。这是冲着咱肚子上下刀子！你再见顾时，要说百帅决没有二心，唯玉帅的马首是瞻！”

过了三天，阎才叫我把顾接来吃午饭，吃饭中间，问起他的来意。顾说：“玉帅叫我请百帅大力帮忙。”阎说：“咱的军队不多，恐怕帮忙也帮不了多少。”顾说：“玉帅也不希望咱们出兵，只想请百帅维持交通。”阎说：“这个容易，你这就可以给玉帅打电报，说我一定照办。”此外，只有一些私人的谈话，顾没有谈起吴说过什么强硬的话，更没有流露张其铨的那些意见。最后，

阎向顾表示：“老袁死了，老段的力量也分散了，现在玉帅是天下一人，我不跟着玉帅走，还跟着谁走呢？”以后每次见面，都本着这个意见和他谈，而我更是以阎锡山的态度为态度了。

皖系代表张吉士的活动

段祺瑞派来的代表是张吉士，安徽人，到太原后，就以同乡关系住在阎的主任参谋台寿铭家里。张吉士曾在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作过排长，和我有师生的关系，所以也和我很熟悉，一有机会就跑到我家里来探听消息。不过我一向对他印象很坏。在他见了阎锡山之后，阎曾问我，张吉士是何许人？我说：“张吉士是保定炮兵科速成班毕业，老段的学生，毕业以后，在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当排长。他的为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样没有人格的人，也配当代表？”

张吉士第一次见阎时，就说：“现在空气很紧。”阎问：“什么空气？”他说：“张雨亭就要和吴子玉开火了！”阎问：“段老师的意见怎样呢？”张说：“段老师希望玉帅在可能范围内，帮他的忙，把吴打倒。”阎当时表示：“我能帮忙，一定帮老师的忙。可惜我没有多大力量。不过，有几分力量，一定帮助几分。”在谈话中间，张吉士没有议论谁胜谁负，也没有说到段的实力如何。我问他：“老段的力量究竟怎样？”他说：“你不要小看老段，他的残兵败将还不少呢！”

张吉士和阎会见以后，阎又召集赵戴文、杨爱源和我开会。阎首先说：“老段来信，叫咱尽力协助。他信中说、他并不是光杆，现在还有很大的力量，卢永祥、郑士琦等固然听他指挥，张雨亭也表示极力拥护。你们看老段现在究竟怎样呢？”我们发言不多，赵戴文冷冷地说：“有一点力量也不多吧？”阎很注意老段的实力问题，他说：“他信上说的这些，是在壮咱们的气呢，还

是真有这些力量呀？”接着，阎锡山又说：“最近老段和张雨亭拉得很紧。他俩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曹吴，要报上次战败的仇，所以彼此勾结。这个事实已经很明了，咱们用不着再研究。问题是将来奉张打胜之后，是把段甩掉呢，还是拥段出山？”赵戴文说：“张雨亭的胡子脾气，还能把老段看在眼里？老张要打了胜仗，曹锟下了台，他还不自己干？过河拆桥，一定把老段甩了！”我当时没有言语，想看看阎的态度。阎说：“我的看法不一样。张雨亭如果聪明些，不能不利用老段。只要奉张能打胜，老段出山，我看不成问题。”说罢，特地问我的看法怎样。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顺着阎的意思说：“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奉系代表于国翰的活动

张作霖的代表于国翰到太原较晚。于国翰也是日本士官毕业生，张作霖的参谋处长。他曾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担任战术教官，不仅和我有师生之谊，而且在山西的军官中，他的学生很多。他教课很平常，所以我对他一向不甚佩服。不料这次他当代表，口如悬河，滔滔不绝，派头十足。他住在招待所，刚到就来找我，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两个多钟头。

他一见我，就说：“我是带了雨帅的信来的，要见百帅，请你多替我吹嘘吹嘘。”接着他就大骂吴佩孚，说：“自从曹锟当了大总统，吴佩孚就想打着中央政府的招牌，说什么统一军权，实际上就是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吴这个人就是那样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他如果得势，咱们就都不能存在。他想武力统一，各省怎么能够俯首听命？这样兵连祸结，全国老百姓就都没有安居乐业的日子了。所以雨帅已经和各方取得联络，一定要除去这个祸根。这一举，关系国家的存亡，希望百帅能和雨帅合作，不仅对我们有利，也对你们自己有利。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吴佩孚还能

允许阎锡山独霸山西，成为他的肘腋之患么？”

接着，他又说：“奉军自从上次战争失败，退回关外以后，曾经检查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军队的素质太差，所以现在大加整顿，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由少帅（张学良）担任参谋长，由郭松龄负责训练军队，完全按照最新式的军事教育进行训练。所以张学良、郭松龄的第二第六两旅，素质最好，可以说是奉军中的模范队伍。”最后，他加强语气说：“你不要拿旧日的眼光看奉军，比老吴墨守成规的老一套要强得多呢！”

于国翰还谈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关系，他说：“北洋的首领是老段，段老师和张雨帅合作，密切得很，他俩是一体。”最后，于国翰郑重地向我说：“我不是来求援的，我是为我们，也是为了你们。我现在不冒冒失失求见百帅。请你先把我今天听说的话代为转达。有什么说得不周到的地方，该减则减，该添则添。等百帅考虑周详之后，再和我见面。”

当天我见了阎，就把于国翰的原话一五一十、不增不减地向阎说了一遍。阎没有多说什么，只说：“这个人相当精明强干呀，你明天就带他来，当面和我谈谈。”

第二天，我就用汽车去接于国翰和阎见面。彼此寒暄了一番之后，于就问：“我和子梁（我的字）说的话，都向百帅报告了吧？”阎点头说：“他说过了，他说得很详细。”于说：“我是抱着和百帅研究、商量的态度。雨帅请百帅帮忙，就是帮大局的忙，也是帮百帅自己的忙。我这个话不知道说错了没有？”阎点点头说：“你说的很对。”于国翰就围绕着这点，谈了一点多钟。阎有时微笑，有时点头，但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停了一会，才问：“雨帅对段先生究竟怎样？”于国翰说：“雨帅对段先生是唯命是从。”他又把段的亲信吴光新往来奔走，梁鸿志、王揖唐、曾毓隤纷纷出关，都得到张作霖重视，待为上客等等情况详细说了一

遍，还说：“雨帅最近慎重得很，很能听取各方面意见，兼容并包，决不轻举妄动。”

这时，阎就轻描淡写地说：“听说英美都支持吴子玉，枪炮飞机尽量供给，雨帅那边兵工厂的枪械能不能持久呢？”

于很兴奋地说：“现在奉天兵工厂是由杨宇霆兼任督办，生产能力比从前扩充了几倍。而且，除了我们自己造的东西之外，还有日本人答应大力援助。日本人说，只要跟吴佩孚打仗，要飞机有飞机，要大炮有大炮，要什么给什么。你想，日本人离得近，英美离得远，这个靠山可比吴子玉硬得多。你们尽可以放心，打一年也不要紧。”于吹得很凶，在他的谈话中，还特别提到：“你不要错误估计，以为曹吴的兵力强大，其实，自从吴子玉上台以后，一意孤行，直系的内部早已分化了。”他在语气里面，暗示给阎，吴的内部已经有些人和奉张取得联络，似乎只要奉张一举兵，吴佩孚的大军，可以不战而溃。至于直系中哪些人和奉张有联系，又是谁负责联系的，于没有细谈，阎当然也不便追问。最后，于说：“我们今天谈得很融洽，我就这样给雨帅打个电报吧？”阎说：“好，我能帮忙的地方，一定帮忙。”于是于国翰又强调了一句：“帮我们的忙，也就是帮你自己的忙！”这才兴冲冲地告辞走了。

当晚我们又开会。阎先把于国翰夸奖了一阵，说：“这个人口才很不错，今天真把张雨亭捧上天了！”他叫我把于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问大家怎样看法。赵戴文说：“这个人有点言过其实！”阎问他指哪一点而言，他说：“帮他们的忙，就是帮咱们自己的忙，话怎么能这样说呢？”阎说：“他们如果打胜了，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话也有一番道理。”赵说：“张雨亭是胡子出身，一向桀骜不驯，还能对段先生唯命是从么？”阎说：“利害一路嘛！他已经宣布独立了，在曹吴这方面说，就是造了反了，段

有上次直皖战争的旧仇，他们都要推翻曹锟的总统，打倒吴子玉。双方面利害一致，拉得很紧，这是合乎人情的。不过，卖瓜的人都说瓜甜，他们究竟力量有多大，能不能打胜仗，咱们还看不出来。”

阎锡山自己的算盘

直、皖、奉三方面既然都先后派来了代表，阎也就分别派出代表前去联系。他派梁航标到洛阳，经常和吴佩孚的总参议李书城联系。山西的老名士田应璜和奉方的袁金铠很有关系，就派他到沈阳。派台寿铭到天津，联系段祺瑞。

三个代表都常有电报到山西。梁航标来电说，和玉帅见面很少，谈话也很简单，只是听张其铨说，吴的兵力强大，可以无敌于天下。梁并向阎建议，一定要慎重从事，不可轻举妄动。田应璜向阎报告，奉方态度很坚决，张作霖励精图治，有了相当把握，才敢宣布独立。张自己说，虽不敢自信必胜，但一定要采取必胜的做法，而且表示，决不过河拆桥。至于台寿铭由天津打回的电报，又极力替段鼓吹，说段和各方面都通声气，决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是个光杆。由于阎曾秘密叫他观察段张双方是否貌合神离，所以来电有“段张精诚合作”的话。当时，阎锡山看到各代表打回的电报，曾经眉开眼笑地说：“照这种说法，双方旗鼓相当，也许能打一阵，不至于和上次一样，一个星期就垮了。”

由于时局紧张，所以我们几乎每晚都要开会密议军事，一开，往往开到深夜。阎锡山为人谨密，所以经常参加会议的，照例只是这几个人。

阎的内心很明显，是拥护段祺瑞的，但对于吴佩孚心存畏惧，对直系的力量，估计较高，所以也不敢不表示拥护。对于奉张，虽然没有什么恩怨，但因为段张勾结很紧，由于拥段，也就

倾向于拥张。他希望借张的力量，打倒曹吴，所以对张也表示拥护，还曾给张打气，叫他充分准备，要有必胜的信心。在这同时，阎锡山对直奉皖三方驻晋的代表，也一律敷衍应付，没有明确肯定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阎锡山这时也正在打他自己的算盘，曾向我说：“咱们应当赶紧充实力量。自己力量不够，哪一方面胜了，也没有咱们的好处。”他特别注意炮兵，向我说：“咱们炮弹足够用了，你看咱们炮兵能拿出去多少？”我回答：“我办的军官训练班、军士训练班，已经有一年多了。”阎叫我：“赶快训练，尽先再成立一团炮兵。”

由于炮兵增加了，其他的兵种负责人也曾纷纷向阎请示：“炮兵增加了，我们怎么不增加？”阎说：“不要慌，一步一步地来。”阎曾一再表示：“我决不成立辛亥年的土匪军队。我练一个兵，要顶一个兵用。有一个兵，发一份饷。”

军队没有增加，但是山西兵工厂的工作却紧张起来了。造炮弹，造子弹，都是日夜赶工；而造步枪、机关枪的车间，却不加夜班。因为阎锡山说：“直皖战争，老段失败，子弹接济不上，也是个主要原因。咱们绝对要让子弹充足，这才能打胜仗。”据我所知，当时库存炮弹已经有六万多发了，可是阎下令，还要加紧制造。

直奉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的动态

1924年9月4日，江浙战争爆发，这就给第二次直奉战争揭开了序幕。9月18日，酝酿了半年以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了。

战争爆发后，齐集在太原的直、皖、奉三系代表的活动，当然更加紧张了。但阎仍保持他的敷衍应付态度，没有什么公开的

明确的表示。

不过，阎锡山对于当时战事的发展，却的确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他很重视他的驻外代表的来电。田应璜、梁航标的来电都比较浮泛。只有台寿铭，由于他原来是阎的主任参谋，军事比较内行，又因同乡关系，和段及其左右都有频繁的接触，所以来电内容详细、确实，而且遇有特殊情况，都能及时报告。因此，阎对台寿铭的电报特别重视。台的来电较多，有时一天之中就有几通电报。阎锡山叫机要处处长高冠臣注意天津来电，而且当面嘱咐负责密电的吴绍之说：“天津来的电报赶紧翻，赶紧往上送，一秒钟也不要耽误。”

有一天，阎向我说：“光凭咱们代表的电报，还不能够充分明了前线战事的情况。你看有什么机警、灵敏、能够吃苦耐劳而又诚实可靠的人，可以设法派到前线，让他每天报告战况，这样比代表们来电更加确实、迅速一些。”这就派了刘映湘担任这个任务。第二天刘就匆匆出发了。大概阎认为只有刘一个人还不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后来他自己又派了一个参谋（姓名已忘记）到前线去。

不久，刘映湘就来了快信，说：“直军作战很凶猛，不过受奉军野炮威力的牵制，很难进展。”在这以前，阎曾经根据各方面搜集的情报判断，吴的队伍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制奉军的机先，先占领了山海关的阵地。因此，阎一直认为直系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曾为此感到紧张。现在，接到刘映湘来信，由于他平时特别重视炮兵，所以他觉得没有炮兵是吴佩孚的致命的弱点。他认为光凭士兵的血气之勇，要战胜奉军杀伤力较大的炮兵，还是很困难的。这样，他的紧张心情才弛缓了下来。

山海关附近直奉两方的战事，进展很慢，逐渐形成了胶着状态。有一天，据刘映湘来信：吴佩孚的司令部设在火车上，随时

转移，常常逼近前沿阵地，吴还常亲自下火车去督战。阎看了信，说：“吴子玉究竟不平常，真敢冒炮火的危险。”我记得当时赵戴文还在旁凑趣说：“我说吴老二是虎将嘛！”阎沉吟了半天，说：“如果吴子玉突破了一点，奉军就能全部垮下来。”他立刻把朱绶光叫来，电告段祺瑞注意，不要因牵一发而动全身。过了两天，段有复电，说已将阎的厚意转告张雨亭；不过深信奉军阵地决不会被吴突破，请阎放心。由此可见，在战争开始时，阎的同情，就完全在段、张这一边。不过畏惧直系的力量强大，所以不敢公开表示而已。就是这一次的电报往返，赵戴文还很顾虑，惟恐被吴佩孚发现。阎却比较沉着地说：“现在战事紧张，恐怕吴子玉还注意不到这里吧。”

其实，在这次战争中，一些机密的消息，还是来自台寿铭的电报。战争开始不久，台曾报告：奉张准备用骑兵从热河袭吴的后路。在这以前，阎曾向我们说过：“这次战争，谁能迂回到敌人的后方，突然出袭，谁就能取得胜利。”可是现在他估计东北的骑兵，吴还是能挡住的，胜利的希望不大。隔了几天，台又来电，据段祺瑞透露的消息，奉张已下令李景林带张宗昌部从吴军的左侧背袭击山海关。阎说：“吴子玉能顶得住骑兵，未必能挡住李景林。这样，奉张的胜利也许有些把握了。”

66 | 10月初，有一天，阎锡山深夜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他说：“刚才得到台寿铭的紧急密电，冯玉祥最近要倒吴佩孚的戈，你们看这个消息是不是可靠？”赵戴文说：“冯焕章的检阅使是曹三爷亲自委派的，他还能倒曹的戈么？”

我想了一想，说：“冯玉祥倒戈，恐怕会成事实。”阎锡山很同意我的看法，说：“于国翰所说，直系内部早已有人和奉张取得联络，可能就是指冯而言。”当下决定次日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

出兵娘子关，阻击吴佩孚

前面说过，阎锡山每逢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只找我们几个人开个小会。自从直奉二次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事的发展，阎一方面加紧练兵，一方面广泛地听取内部各方面的意见。他采纳了我的建议，每逢星期六下午，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在得到冯玉祥倒戈消息的第二天，阎就临时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阎并没有表明他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没有谈出他对谁胜谁负的估计，更没有透露冯玉祥倒戈的消息。他只是说：“山西一贯是主张保境安民的，这一次战事，不管谁胜谁败，为了防止败兵骚扰，决定出兵加强娘子关的防御。”阎在会议上宣布，派第二师师长孔繁爵为左翼总指挥，带四个旅，配炮兵、工兵各一营，即日向娘子关开动。原来山西只有十团兵，现在把四个团升格为旅，号称四旅，实际上还是四团的兵力。这四个旅是：第三旅，旅长费金桂；第四旅，旅长谢濂；第五旅，旅长刘树藩；第七旅，旅长龚奉山。

会议以后，阎锡山向第一师师长商震说：“阎玉琨、岳维峻的队伍，驻在陕晋的边境，是山西的腹心之患。我准备派你做右翼总指挥，负责指挥这一方面的队伍，所以派孔繁爵到左翼去。你看我这种安排怎样？”商震每次出席会议，都是仪容端正，毕恭毕敬，现在听了阎锡山这番话，更是唯唯听命地说：“百帅的布置，真是老谋深算。云生（孔繁爵的字）到娘子关去，很好，我完全同意。”

在孔繁爵带队向娘子关开拔后，没有几天，就听见李景林、张宗昌的部队已由冷口猛力前进，进展极速，而冯玉祥倒戈的消息也已经证实。接着，又得到情报，吴佩孚败退天津，并没有放弃斗志，已经分电河南、江苏、湖北各省的军队，星夜北上支

援。阎这才明白向我们表示：“现在咱们可要正式出兵了。河南寇英杰有五万大军，还有湖北萧耀南的队伍，我们如果不把石家庄卡住，听任他们长驱北上，吴子玉还很可能转败为胜呢。”于是阎就急电孔繁蔚进驻石家庄，无论怎样困难，也要把寇英杰的队伍挡住。这时，阎很忧虑兵力薄弱，惟恐不能阻止寇英杰的队伍。我建议，先把沙河铁桥破坏，构筑阵地坚守；万一不守，再出石家庄和他决战。阎采纳了我的建议，可是他总感到孔繁蔚软弱无能，恐怕指挥不了这么多军队，就急电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去接替孔繁蔚，担任左翼总指挥。

就在这时，山西省内又发生了一件使阎锡山很伤脑筋的事——阎玉琨派有队伍到运城去劫收盐款。当时运城盐运使署恰好有 300 万现款尚未运出，所以盐运使崔文征就急电到省，请派军队前往援助。阎锡山命令商震、郭宗汾和我，带领李培基、王嗣昌两团及炮兵一营，即刻开往运城。我和商、郭奉令之后，就命令军队连夜开拔。我们坐着小汽车，连夜向运城出发。太原离运城 900 里地，我们只走了 20 个小时，第二天上午 9 点左右就赶到了运城。这时，队伍还在中途。我就命令副官到城内的学校民房等处号房，准备队伍驻扎的地方，并在门口分别贴上：“某部、某团、某营驻此”的标志。于是小小的运城县内立刻全城轰动说：“省里的大军开到了。”阎玉琨部下来劫夺盐款的士兵不过一连人，正盘踞在盐运使署内，准备将 300 万盐款运走，听说我们大军已到，惟恐众寡不敌，立刻纷纷逃窜了，连随身的行李都顾不得携带，300 万现大洋自然更是“莫奈何”了。其实我们的队伍，第二天下午才有先头部队赶到运城。我们立刻叫人把盐款装上卡车，派专人运回太原。我们接受了盐运使崔文征的盛大的招待。商震借口调查沿河的地形，我就跟他一块游山玩水，住了半个月的光景，才得到阎的命令，从容回到太原。一到太原，就

听见石家庄前线传来的惊人消息。消息的惊人，不是由于战事方面有什么急剧的变化，而是第五旅旅长刘树藩、第七旅旅长龚奉山都被左翼总指挥张培梅给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了。

孔繁蔚在石家庄方面的布置是，黄、谢两旅驻石家庄，刘、龚两旅在前方。寇英杰的军队曾一度向沙河进攻，但一经山西军队的还击，就向后撤退了。晋军在最前线指挥战事的营长齐用宏，立刻用电话向旅长刘树藩报告说：“敌人虽已后退，但是我军力量单薄，希望赶紧增援。”这时孔繁蔚已回太原，张培梅刚接事，刘树藩就和龚奉山向张培梅请示。张培梅已有三分生气，就命令刘、龚二人前来当面报告。刘、龚因为军情紧急，派了两个参谋长去见张。张一见，更加上三分气，说：“你们两个滚回去，叫你们旅长来。”刘、龚只好回到总指挥部去。张培梅立时责骂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叫你们自己来，却派参谋长来代见。”当时，龚奉山声辩了几句，于是张培梅一气就气到了十分。龚奉山原来是第七团团长，是阎锡山卫队团团长，经常随侍在阎的左右。张培梅每次和阎见面，龚奉山常在旁说东聊西，指鹿为马，张早已积怒在心，现在看见龚不遵守命令，还敢哓哓置辩，分明是凭借阎锡山的后台，瞧不起他这个总指挥，立刻命令把龚斩首。刘树藩平日为人很谨慎，从不多言乱语，现在大惊之下，不由得也分辩了几句，张培梅更是十二分生气，把刘也正法了。随军没有刽子手，都没有“斩首”的经验，一连几刀，才把人头砍下，还把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营门示众。张培梅杀了龚、刘，还问第四旅旅长谢濂：“你怕不怕？”谢濂因为嘴部受过伤，发音不清楚，这时吓得连声说“Kua，Kua，Kua”，连“怕”字也说不清了。

当时石家庄的队伍，号称四个旅，两个旅长都被张培梅给就地正法，而且还枭首示众，这不能说不是件大事。消息传来，大

家都很震惊，特别对于刘树藩的死，更认为冤屈。甚至有人向阎锡山说：“鹤峰（张培梅的字）要造反呀！”阎嘴里说不会，心里也有些不愉快。不久，张培梅又来电话，李服膺营长“长于交际，短于用兵”。阎怕他又把李服膺杀了，连忙去电将李调回。在阎上次召开军事会议后，李服膺曾来见我，极力说吴军必败，并说他和奉军将领刘翼飞、胡毓坤等人交游甚多，主张阎联张倒吴。我叫他直接去见阎，听说阎对他的意见颇表赞同。可见李服膺“长于交际”，确有来历；而后来抗日战起，李服膺首先因败战被诛，当时的执法总监就是张培梅。那么，张培梅说他“短于用兵”，仿佛真有“知人之明”。其实，李服膺的死，只是他和张的个人恩怨而已（关于李服膺的死，容当另文叙述）。

张培梅在石家庄做好了阵地，构筑了很多堡垒，命名为“鹤峰堡”，预备寇英杰队伍杀到，和他硬拼。不料寇的军队只在沙河前线小有接触，始终没有开上来。这时，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吴佩孚，看见石家庄被阎卡住，山东的郑士琦又宣告中立，津浦、京汉两路的援军都不能开到，部下人心涣散，如果和张作霖、冯玉祥两面作战，很难获胜，只好接受了部下的劝告，坐上轮船，狼狈地逃往武汉去了。

曹錕已被冯玉祥逮捕，吴佩孚又已南逃，张作霖乘胜入关，在天津和段祺瑞、冯玉祥等先后见面，酝酿新的局面。阎锡山在出兵后，即电段、张等表示态度，这时自然贯彻他的初衷，拥段出山。恰好田应璜从奉天回到太原见阎，阎就命他到天津，参加天津会议。临行，阎还再三叮咛，要强调拥护段祺瑞。不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就出现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的招牌。

吴佩孚的势力土崩瓦解，拔去了阎锡山背上的芒刺。段祺瑞

又被拥上了“执政”的“极峰”，给阎增加了背后的靠山。这时阎锡山当然是踌躇满志了。不过，这次山西在运城对付阎玉琨的不过是一出“空城计”，而在石家庄也是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和寇英杰一决雌雄。所以阎在后来召开的一次团长以上军事会议上说：“这次出兵石家庄，是一次冒险的动作，侥幸成功。咱们号称四个旅，实际是四个团。如果寇英杰真正有种，咱们就挡不住。”可是，阎锡山下决心要扩充队伍，增加个人的实力了。

阎锡山的军队，在袁世凯时代的编制，只有十二混成旅一个旅，旅长黄国梁。袁死后，扩成四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商震；第二旅，旅长马开崧；第三旅，旅长孔繁霁；第四旅，旅长赵戴文。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以后，改成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商震；第二师，师长孔繁霁。现在又进一步充实、整编，扩成两个师、七个独立旅、八个炮兵团。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如下：

第一师师长商震

第一旅旅长傅存怀

第一团团长杨效欧

第二团团长卢丰年

第二旅旅长王嗣昌

第三团团长李培基

第四团团长侯守常

第二师师长孔繁霁

第三旅旅长李维新

第五团团长文海

第六团团长荣鸿儒

第四旅旅长谢濂

第七团团长程廷栋

第八团团长傅作义

第五旅旅长丰玉玺（以下均为独立旅）

第九团团长傅汝钧

第十团团长张荫梧

第六旅旅长杨爱源

第十一团团长赵承绶

第十二团团长孙楚

第七旅旅长杨中科

第十三团团长杨昆祥

第十四团团长高冠南

第八旅旅长丰羽鹏

第十五团团长关福安

第十六团团长金铸九

第九旅旅长荣鸿胪

第十七团团长荣鸿胪自兼

第十八团团长辜仁发

第十旅旅长蔡荣寿

第十九团团长白毓晋

第二十团团长许晟蔚

第十一旅旅长李德茂

辖卫队营、宪兵营

炮兵司令周玳

第一团团长辜仁发

第二团团长杨耀芳

第三团团长温玉如

第四团团长曾延毅

第五团团长卢玉光

第六团团长周俊杰

第七团团长冯鹏翥

第八团团长王锡符

手榴弹旅旅长张振万

第一团团长赵永胜

第二团团长王万胜

(周珉口述 李大同 李宜琛整理)

三 参加直奉反冯战争：醉翁之意不在酒

1926年，直系的吴佩孚和奉系的张作霖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也和直奉合作，首先是出兵顺德（即邢台）、保定，给吴佩孚队伍的北上开路，继而又在大同方面牵制了国民一军的部分兵力，使国民军陷于前后受攻的局面，处境极为艰险。我在当时，担任晋军的炮兵司令，这几次战役都曾亲身参加。现在把当时晋阎方面的措施和战事的经过，就记忆所及，追述于下，以供研究近代史者参考。

战争前夕吴、张、冯的代表纷纷前来拉拢阎锡山

1926年初，山西所处的形势还不像即刻就要发生战事的模样。可是不多几天，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的代表，又都在太原城里先后出现，仿佛又是直奉二次战争前夜的光景。

这一次，首先来到太原的是冯玉祥的代表，也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代表段祺瑞来并的张吉士，他这回仍然住在台寿铭家中。台寿铭因为上次当代表报告情况确实而又及时，对于阎锡山出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因功擢升为参谋长，颇得阎的信任。台和张是安徽同乡，交情甚厚，就陪张去见阎。

张吉士见阎，表示希望阎能和国民军进一步合作。他还分析

当时国内的形势说：“奉张因为郭松龄倒戈，李景林携贰，若不是日本人替他撑腰，不许郭松龄通过南满铁路，早已一败涂地。现在奉张虽然还能苟延残喘，可是元气大伤，最近这个期间只能在关外休息整顿，决不敢再问鼎中原了。吴佩孚在湖北，和萧耀南同床异梦，他的精锐部队在上次战役中早已损失净尽，现在都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队，作战能力当然不是当年可比。”接着又说：“国民军占有华北京津，特别是察、绥一带，和山西是比邻，真是唇齿相依的形势。就地理来说，山西与国民军合作最为妥当。”

当时国民军占据察绥，和山西省的雁北十三县犬牙相错，恰好雄踞在山西的后背，对于山西来说，真是腹心之患。如果得罪了国民军，以国民一、二、三军的力量来夹攻山西，虽有雁门关、娘子关的天险，也很难坚守。所以阎锡山听张吉士说到这里，当然心里不会愉快，表面上却丝毫不露，还含笑说：“焕章一切新政，都是实获我心，很好，很好。”这时，我不由插了一句嘴道：“冯先生已然通电下野，你们不是群龙无首了么？”张微微一笑说：“何至于此！冯先生下野，虽然布置由张之江、李鸣钟指挥，鹿钟麟策划，实际有长途电话，随时向冯先生请示，还不等于冯先生直接指挥么？”接着又吹嘘冯练兵的特点，说纪律如何严明，与士兵如何同甘苦，因此国民军上下团结，非常坚强。他还说上次直奉战争，冯部不但丝毫没有损失，而且收编了许多吴佩孚的残部，实力反加充实了。这一天，阎锡山还是用他平素的那套作风敷衍了一番，并没有什么肯定的答复。

吴佩孚的代表还是顾祥麟。他来到太原，交际处把片子送进去，阎锡山很冷淡地说：“你把片子放在那里吧。”顾祥麟一连几天没有见到阎，有些慌了，才来找我。我说：“也许老总还不知道吧，我替你问问。”我去见阎，说：“顾祥麟代表吴子玉来见，

为什么不见他？”阎故作惊讶，说：“他是吴子玉的代表么？”我以为他是来领薪水的呢！你快把他引来。”我刚要辞出，阎又把我叫住，说：“你顺便通知军需处，把顾祥麟的薪水算好送来，全要现洋，不要票子。”原来顾上次来时，阎为了笼络他，曾给他一个参议名义，每月支夫马费100元，这笔钱顾未随时来领。军需处初听说顾来到太原，就向阎请示，是否给他准备好送去，阎当时很不耐烦地说：“谁要你们管这些闲事。”这笔夫马费虽然数目不大，累积起来，也有1000多元了。

顾祥麟见了阎锡山，极力为吴佩孚吹嘘说：“玉帅愿与百帅尽弃前嫌，仍修旧好。玉帅自到湖北以后，对内部大加整顿，现在实力不仅恢复，而且胜过以前。不过，玉帅对冯玉祥倒他的戈，一直耿耿于心。而且最近冯的措施，非常乖谬，口口声声救国救民，实际上不仅勾结广东的民党，而且还和苏俄秘密联络，意图赤化全国。东北的张雨亭也因为冯的倒行逆施，极为痛恨，愿意和玉帅携手，大张挾伐。”

我记得阎锡山那天与顾祥麟似乎谈得很投机，提到年前国民二、三军联合建国豫军樊钟秀合攻山西的往事，还谈起国民一军也曾有进攻山西的计划。他最后说：“冯军不但是玉帅的敌人，也是山西的敌人。玉帅如果发动义师，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也理应竭力协助。”在顾辞出的时候，阎就把顾的薪水当面交给他，更使顾祥麟喜出望外，称谢不迭。一包包沉甸甸的现洋，由两个马弁替顾送到汽车上，还拿不完，在我代阎送顾出府的时候，还替他顺便拿了两包。

奉系代表于国翰是最后来的，一到太原就找我，说是带来了张作霖的亲笔信，要见阎锡山。阎听说，立刻请他会面。于国翰这次态度比上次客气，而谈风却依然很健。他是从郭松龄倒戈说起的。他说：“冯玉祥自己倒了吴子玉的戈，还要勾结郭松龄、

李景林倒雨帅的戈。幸亏东三省有日本的特殊权益，郭松龄才没有成事。这一次，给雨帅很大的教训。他认为冯玉祥是个祸根，如果不除，这种犯上作乱之风将永远不会消灭。现在不但中国人对冯痛恨，连日本人也恐怕冯要一旦成功，中国就要全部赤化，也极力表示愿意帮助雨帅，消灭冯的势力。所以雨帅决心和吴子玉合作，打倒冯玉祥。不过自从冯军占领京津一带，财源富足，国民一、二、三军之外，又加上东北方面的魏益三也投靠了冯玉祥，改称国民四军，兵力也不算少。即便直奉合作讨冯，这个仗也要费点力气，所以雨帅特叫我来面见百帅。雨帅说，上次百帅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次为了消灭国贼，一定还得继续帮忙，咱们三方面合作，消灭一个冯玉祥，那就可以胜券在握了。”阎锡山笑着说：“可惜山西的力量还很薄弱。”于国翰不等阎说完，连忙说：“百帅不要客气，我知道自从上次战事之后，贵省的军队大加扩充，力量远胜过从前了。”他看见有我在旁，就顺便恭维了我一句：“你们炮兵就练得踏实，比我们的邹作华强得多。冯玉祥的大刀还能胜过大炮么！”说到这里，他俩都不禁笑起来。接着，于国翰又将冯玉祥的“罪恶”数了一番。在于国翰“慷慨陈辞”的时候，阎锡山也连连点头称是。于是就问阎有什么指示，可以转达雨帅。阎说：“雨帅和玉帅在中原会师的时候，我一定追随。”

三方面代表齐集太原以后，阎锡山召集他的亲信举行军事会议的次数，也就频繁起来，几乎每晚有会，每次都要到深夜才散。在会议时，大家的意见都倾向于倒冯。赵戴文引经据典，咬文嚼字，几乎把冯玉祥说成“洪水猛兽”。我也是极端反对冯玉祥的一个。只有参谋长台寿铭却极力主张和冯合作。我说：“和冯玉祥共事，等于引狼入室。他一定要把你吃了。”台说：“你不和他共事，他更要吃掉了你。”台从战略上说明不能反冯的理由，

他说：“奉军远在关外，吴佩孚的势力也在两湖江浙一带，而冯的力量却近在华北察绥，国民一、二、三、四军正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扼住了山西省的咽喉。如果我们不和冯玉祥合作，他以全力进攻山西，等于泰山压顶，纵有张、吴的外援，也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

台寿铭的分析，当然也是切合实际的。我想阎锡山不敢马上答应张、吴的要求，和冯立即反目，原因就在这里。而冯的为人，反复无常，不仅为我们所不齿，阎锡山对他更是早有戒心，所以不能采纳台寿铭的建议。因此，尽管台寿铭屡次向阎进言，张吉士还常常见阎，透露出“如果阎敢于和张、吴合作，国民军就要首先进攻山西”之类迹近威胁的语气，而阎锡山还是迟迟不肯表示肯定的态度。

假借名义进军京汉线

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索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冒然得罪人的。可是，出乎我们的意外，3月中旬的一天，他突然把我和商震找去，说：“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着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

当时顺德的驻军郑思成，是国民二军的部属。张吉士听说老阎要对顺德用兵，非常诧异，就找台寿铭一同来问讯。阎说：“我们出兵顺德，完全为了解决孔庚，这是山西内部的问题。孔庚不解决，山西不能自保，还怎么能够拿出力量来帮助你们总司

令呢？”

原来孔庚是吴禄贞的旧部，吴禄贞被刺以后，就和刘廷森（字樾西）、仇普香、李敏等人一同逃到山西。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当上了山西都督，派孔庚作朔北兴讨使，给阎帮了很大的忙，就委他作第一师师长、大同镇守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阎锡山上表劝进，孔庚却发出通电声讨袁世凯的叛国罪行。袁世凯还没有什么表示，阎锡山却慌了，将孔庚撤职拿问，押解到太原，表示他对袁忠心耿耿。可是袁世凯不久就死去了，阎锡山只好仍作民国的督军，而孔庚却和阎闹翻了脸，一气离开山西，从此坚决反阎。1925年，孔曾联络建国豫军樊钟秀和国民二军胡景翼等部进攻山西，虽然没有成功，却使阎锡山大伤脑筋。所以阎对张吉士再三解释，似乎山西有不得不对顺德用兵的苦衷。

当时山西出动的队伍是商震的一个师和杨爱源的第六旅，还有炮兵一团由我带领。我们先到石家庄，派杨旅驻在石家庄防守，其余队伍将京汉线的元氏、高邑、赞皇等地郑思成部的前哨肃清以后，乘火车一直开到顺德附近。和郑思成的军队激战了一天多，郑军不支，退守顺德城。第二天拂晓我军攻城，先用炮兵轰击了半个小时，由杨思元团派人从城墙爬进城里，打开了城门，大军涌入，和守军发生巷战，守军支持不住，终于请降。我们随即派人搜查郑思成和孔庚的下落。有投降的兵士告诉我们，郑思成在兵败入城以前已先逃走，孔庚原在城内指挥，看见大势已去，才逃到天主堂内藏匿起来。我们忙派了一连人去天主堂搜查，一进教堂，果然发现有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形迹可疑。有人问：“你是不是孔庚？”那人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孔庚，你们要怎么样？”兵士们听说他正是孔庚，就要上去捆绑。他大声喝道：“你们不要无礼，我和你们的长官都是朋友。你们是谁带队来的？周玘来了没有？叫他们来见我。”士兵看他气宇轩昂，不

敢对他动粗，忙派人向我报告。我赶到天主堂一看，果然是孔庚，便向他说：“老总叫我们请你回山西，就请你和我们一路走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你要不去，我们都交不了差。”纠缠了一回，他才说：“我本来是不到山西的，不过，冲着你们就走一趟吧。”

我们拍电向阎告捷，阎回电叫我们派人将孔庚押送回省。全军驻石家庄待命。我们当即照办。事后听说，孔庚解到山西后，被软禁在都督府内的庆远楼，过了两个月就把他放走，临行时还送了他3000元旅费。

我们回到石家庄，休息了一天，得到阎的命令，叫杨爱源带队先回太原，其余部队向保定开拔，解决魏益三的国民四军。我军开到保定，魏益三派人前来请降，还接商震和我进城吃饭。我们向阎打出电报报告以后，就进城和魏会面。在我们酒酣耳热的时候，商震接到阎拍来的电报，看罢以后，只说：“老总听说友仁（魏的字）肯和山西合作，非常欢迎，同意‘正义军’的名义，委友仁为军长。”从此，魏益三的国民四军的臂章，就改成了“正义军”的字样。事后，我才知道阎的来电还说：“不可进城吃饭，免中对方奸计。”

我们在保定休息了几天，又接到阎的急电，叫我们全军回省，我们便匆匆离开保定，向太原回师。路上遇见一些队伍正向北开，旗帜上写着“讨赤军”，听说是吴佩孚的队伍已经北上了。

在我们回太原的路上，传闻参谋长台寿铭被扣了，押在副官室，由朱绶光继任参谋长。台跟阎多年，颇得信任，充当参谋长的要职，突然被扣，很出我的意外。

我们到太原以后，才知道这一个多月的变化的确不小。吴佩孚已经和张作霖宣布合作讨冯，阎锡山也决定和直、奉合作。三方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军和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

直攻京津；晋军则从大同方面进攻察绥一带的国民军，对国民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在我们离开太原以后，晋军又增加了两个师，王嗣昌为第三师师长，谢濂为第四师师长。谢濂奉命带丰玉玺旅和部分炮兵到大同布防。王嗣昌师则驻在阳高。孔繁蔚师带领李德懋旅向得胜口、杀虎口一带前进。杨爱源旅从石家庄回太原后，也被派到大同去增援。可是国民一军在察绥一带驻有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兵力相当雄厚。相形之下，山西在大同的防务比较单薄，所以阎又把商震和我调回。我们一回太原，阎就发表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孔繁蔚指挥左翼，王嗣昌指挥右翼，我则带领炮兵配合作战。在太原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和商震的队伍一同开往大同。

就在我回到太原的这天晚上，机要处长高冠臣特来看我。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直奉和阎合作的局面，在我们出兵顺德以前早已形成。当时吴佩孚已在武汉集结了相当兵力准备北上，要求阎出兵京汉线，给他肃清顺德的国民二军，减少直军北上的障碍。可是当时直军尚未北上，奉军主力也未入关，阎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军，以免国民军的枪口都集中到山西方面来，所以才用讨伐孔庚作为出兵的借口。在这阶段，国民军还极力拉阎，阎也虚与委蛇，答应国民军的眷属专车可以通过大同撤往绥远。其实，在我们出发顺德后不久，谢濂就奉命开往大同，接着阎就下令破坏了大同一带的京绥铁路。等到直奉的主力已经集结京津附近，战事显然对国民军不利时，阎才正式和冯翻脸，公然采取作战的措施了。

后来我问到台寿铭被扣的原因，高冠臣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突然。老总向来脾气温和，这次不但把林逸（台寿铭的字）撤职，而且押在副官处，不许和外面人见面，那就很不寻常了。如果仅仅因为他和冯是同乡，平时又极力主张联冯，那也只是政

见不同，顶多把他调派别的职务罢了，何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呢！老总和直奉合作本来是很机密的，连你事前都不晓得。可是从国民军的部署看来，在察绥一带集合了这样大的兵力来对付山西，很明显，这是早已知道了我们这方面的作战计划。山西内部有什么人泄露这些机密呢？当然林逸的嫌疑最大，因为他是参谋长，可能老总事先和他谈论过什么，而被他泄露出去了。”

与国民军在晋北的战斗

商震和我带领队伍，用急行军开过雁门关，直奔大同前线。当时的局势对晋军很不利，因为国民军韩复榘的部队已经先发制人占据孤山的高地，雄踞在谢濂队伍的左前方，威胁很大。谢濂命令丰玉玺旅夺回孤山，猛扑几次，都被国民军密集的火力打退，伤亡严重。十三团团长杨曾祥阵亡，六团团长张荫梧受伤，住大同城外首善医院治疗。最后，丰玉玺本人还被对方俘虏了。谢濂的队伍已经不支，正要向后溃退，如不制止，连我们新开到的援军都要受到影响，势必全线崩溃。我便连忙赶到孤店村谢濂的司令部，谢濂正倒在床上吸鸦片烟，我说：“部队都垮下来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抽大烟？”话言未了，院外人声嘈杂，都是败下阵来的散兵。谢濂赤着脚跳下床跑出去，在司令部门口枪决了两个营长，才把混乱制止住。这时，商震的步兵还未开到，我连忙把炮兵开上前线，也没有布置阵地，就找比较高的地形，把三营炮兵排开，叫炮兵用零线子母弹向敌人射击。山西的炮兵都配有机关枪，远的用炮轰，近的就用机关枪打。打了几个小时，正面的阵地才稳定下来。随后商震的队伍开上来，将谢旅换下休息。这以后，双方成为对峙的局面。

国民军方面轻重机枪相当厉害，听说是俄国的水连珠机枪，既好使，又威力大。他们阵地很坚固，掩蔽部都是钢轨铁板构筑

的。我们的大炮不能击毁它，因而步兵很难攻上去。但对方缺乏大炮，听说俄国给了他们两门大炮，但炮弹尚未运到，对我们步炮联合的优盛火力，无法制压，因此他们屡次进攻，也都吃了大亏。这样，双方势均力敌，都很难取得进展。

有一天，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对方阵后有一列闷子车正顺着铁路向前开进。我只看见长长的一列，但不知道是军队还是辎重，就命令野炮集中火力向这列车开炮。我从望远镜里看见打翻了一辆，有士兵在蠕动着向外爬，这才知道是敌人的增援部队，于是一连炮轰了几个小时。事后听说，宋哲元因为猛攻我们的阵地不但毫无攻效，而且都吃了亏，便自己带着队伍前来增援，被我方炮火打得猛烈，只好从车上跑下来，在沟里藏了很久。

这样激烈的战斗一连进行了七八昼夜，我们正在前线打得难解难分，商震突然接到阎的电话，说：“奉张有电报来，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叫我军把孤山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做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奉张的骑兵打到察北，占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届时再给电报。”阎在电话里说：“我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我军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现在要你们火速撤离原阵地，转移至雁门关一带，作攻势防御，应立即行动，以免无谓的损失。”商震答说：“现在战事十分激烈，粘得很紧，撤不下来！”阎说：“你叫子洪（我的字）听电话。”我把电话接过来，阎说：“这是生死关头，一定要撤！”我说：“前线战事并没有失利，现在一撤兵，全军动摇，也许会不可收拾呢！”阎说：“这是战略关系，非撤不行。你听我的话没有错。”我考虑了一下，就向阎说：“这时无论如何不能撤，我和启予研究一下，晚上再撤。”阎同意了。

我挂上电话，连忙找商震计议。商踌躇说：“现在如何能

撤？”我说：“你不用着急。到黄昏时候，我命令全部炮兵连续射击一个小时，打得他们机关枪一点都不能活动的时候，你立刻让号兵吹起冲锋号，这样，敌人一定要暂时后退，他们一退，咱们即刻往后撤。”商震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就照计而行。我们于是在阵地两侧都派出侦探，一发现敌人有后退情形即刻报告，并派杨效欧团作掩护队，配合一连炮兵坚守阵地，掩护全军撤退。我们就这样从前线上安全撤了下来。

我们到了大同也没有进城，忙打电话向阎报告。阎很高兴，叫我们赶紧退守雁门关，把阵地布置好。

当时，阎锡山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他的整个布置是：商震指挥的队伍，撤雁门关。右翼王嗣昌师带同第六旅撤到繁峙附近沙河，指挥东起平型关、西与雁门关附近联系。左翼孔繁蔚、李德懋撤至阳方口一带，不使敌人有迂回窜扰的机会。为了不使敌人占据雁北富饶的地区，采取“钉钉子”办法，派傅汝钧旅李生达、萧维汉团配有炮兵营、手榴弹营，帮助张汝平（代理大同镇守使）守大同，傅作义团守天镇，李服膺营守浑源，魏德新团守朔县。阎命令这些队伍必须死守。

在我们离开大同退到怀仁的时候，我主张不要停留，连夜退入雁门关，以免敌人的两翼迂回过去。商主张在怀仁稍事整顿，大家也赞成休息几天。

商震刚把司令部设在怀仁城里，不料第二天就得到情报，说前线的国民军当天只退了20里，第二天发现晋军是退兵之计，又向大同进攻了。商震主张守怀仁。我因离怀仁只有10余里地的柳东营已经发现有国民军的队伍，可能敌人采用迂回战术向雁门关前进，我们的后路随时有被敌人截断的可能，因而极力主张后退。但商不同意，主张在怀仁城外布置阵地。我就直接和阎通电话。阎一听就急了，说：“赶紧退！”还说：“无论如何，要服

从命令后退。你们要不听话，让敌人占了雁门关，我完了，你们也完了！”于是，我们午饭也顾不得吃，忙和左翼第二师孔繁爵师联系，因为阎曾命令孔部掩护我们后撤，不料第二师已经退远了。原来孔繁爵的部队，在我们左侧背一带抵御国民军的石友三部，因为石友三行动迅速，占了左云、右玉等地，孔部团长高冠南、荣鸿儒阵亡，团长孙祥麟被俘，孔抵挡不住，连忙率残部退远，就和我们失掉了联络。如果石友三越过怀仁去攻雁门关，就可能截断我们的后路。但是石友三和大同前线的韩复榘部也没有联络上，不明孤山方面的战况，不敢贸然前进，一连迟延了三天。这是我们事后听国民军的投降军官说的^①。

我们队伍走到山阴县的岱岳镇，原来准备打尖休息，按照阎锡山的布置，谢濂的部队应当在安印子河（后改名普济渠）一带掩护我们后退，不料我们走到那里，连一个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于是我们也顾不得打尖了，继续往后撤，总算是一路平安地撤到了雁门关。到了雁门关，大家又饥又渴，疲惫不堪，但不得不支撑着利用雁门关的地形，沿着长城构筑阵地。温玉如营在左翼老杏沟、磨盘山一带，杨耀芳营在右翼水峪口右后方。我在中路布置，还就全线阵地视察了一遭。商震的司令部设在雁门关外广武镇内，我的炮兵司令部设在内长城上娘娘庙内。如果用精度较好的望远镜，在天晴的时候，可以一直望见大同，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所。我们就在这一带与国民军对峙了83天半。

有一天，天将破晓，国民军猛攻我军右翼小馒头山阵地。小馒头山北边是张培梅所属傅存怀旅的阵地，军风纪最坏，往往白

^① 石友三部军务处长张潜、中校参谋李约农，在晋军后来进驻绥远时，因和我有先后同学关系，找我部下的参谋联系向我输诚。上述情况，就是当时听他们说的。我曾向商震说：“如果石友三的队伍当时往前进50里，我们就都被俘了。”

天就在帐篷里聚赌，可以说是我们全线最薄弱的一环。我早就发现问题，曾经提请商震注意，商震派了参谋李嘉麟前往视察。不料当天晚上石友三派了 3000 名敢死队，每人带着大刀、自来得，由一个旅长率领，摸进了傅旅的防地，一连用大刀砍死了几十个人，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我听说小馒头山已被敌人占领，连忙用电话通知杨耀芳营速将大炮向小馒头山集中射击。不久，天已大明，石友三的队伍在山上站不住脚，纷纷退到低洼地带。商震已派团长杨思源带一团人赶到，用手榴弹进攻。这一仗，从拂晓一直打到 10 点左右方才停火。事后清理战场，据说石友三的 3000 敢死队只逃出了六个人，不过那个旅长早跑了。

在小馒头山战斗打得正紧的时候，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以为是馒头山失守了，大吃一惊。阎锡山一着急，照例背着手在屋里紧转，一声也不吭。这一次，又是如此。直到我打电话去报捷，他才转忧为喜。当天阎就派赵戴文带着一大汽车的现洋和他的亲笔信，到前线来慰劳。赵戴文把信直接交给商震，商没给我看。随后，商震派人按着人数把兵士的赏金分发了。战后我回到太原，军需处长曹善之请我吃饭，他说：“老总对你的炮兵，另眼相看，特别单给你们炮兵发了 4 万块赏金呢！”我这才知道商震还搞了这么一个鬼把戏。

85

国民军的失败及晋军进驻察绥

8 月初旬的某天晚上 10 点多钟的光景，副官向我报告：“有一个人拿封信来，要亲自会见司令。问他是谁派来的，他不肯说。”我想也许是太原方面送来的密信，连忙叫把来人带进来。来人见了我，才说：“我是张自忠派来的副官。张旅长有封信，还嘱咐我，请司令务必严守秘密，不要给别人知道。”我拆开信

看，张信的大意是：这次战事，石友三恨他刺骨，他处境很难。现在国民军已经下了撤退令，他如果随同撤下去，石一定会置他于死地。希望我见信后，速去接他。他一定带领全旅两团人和一营工兵归附阎锡山。信里还说，撤退令一并附上，希速办理，否则于事大不利，他的生命也将不保了。

我看罢了信，就匆匆写了几个字：“今晚决定行动，决不叫你吃亏。”叫来人带回。

我把来人打发走了以后，便匆忙赶到广武镇去找商震。商看罢信，叫我赶紧去，还嘱咐我多带几个人。我便和卢丰年带了几个副官，连夜去到安印子河张自忠的防地。卢丰年走在前面，他先走进张自忠的旅部，我看没有动静，也往前走去。这时，张自忠正同卢丰年出来迎接，就一同回到旅部。张简单地告诉我：“石友三几次前来视察阵地，都很生气，屡次说如果张凌云旅长在此，决不会如此，言下这次进攻失败，都应由我负责。我要撤退，他一定会杀我的头，所以只好投降晋军。”匆匆说罢，他立刻下令吹号集合，整队出发。我们三个人骑马在前，队伍随后步行，一同开到雁门关，和商震会见。事后知道，张自忠这次归附晋军，他部下的团长张俊和工兵营长李兆镆事前都完全不知道，是他一人决定的。

86

这时，天已大明，我忙打电话向阎报告。阎很高兴，命令我们即刻向大同方面追击国民军；张自忠的队伍，可仍由他率领。但张自忠表示不愿再带队伍，请求允许他到太原闲住一个时期。经阎同意，我们就派人接管他的队伍，把他护送到太原。

我们即刻下令追击国民军。步兵动作较慢，我骑马带领野炮走在队伍前面，顺着公路进军，一路无阻地到了大同。

我们队伍到了大同不久，商震的队伍也陆续开到了。宋哲元派了骑兵旅长李显堂拿着宋的信来见商震和我，商量停战的事。

我们即用电话向阎报告，阎表示同意。从阎的电话里，我们对于整个战争形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原来奉张的队伍已经占领多伦，正在向张家口前进。吴佩孚正指挥队伍向涞水、涞源、怀来三路进攻。国民军处于直奉联军和晋军前后夹攻之下，南口、大同两面的战事都陷于不利的境地，先后溃败，所以只好停战。不久，国民一军的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的队伍，都先后投降了晋军。

阎锡山令派商震代理绥远都统。韩复榘师编成第十三师。陈希圣师编成第十五师，驻在绥远。石友三师编成第十四师，驻在包头。阎以冯的队伍，如不整编，将来不好使用，曾来电报嘱我与商震商量。商震说：“这部分人刚刚收容过来，如加以改编，恐引起误会。石友三是我的学生（石是商在吉林测绘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很靠得住。韩复榘、陈希圣都和我很相好，我相信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请老总放心。”

在绥远住了一个时候，我们和韩复榘等都厮混得很熟了。有一天，韩复榘在塞北关衙门请吃饭，他向我谈起国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说：“冯先生在军队里造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事事都听他一人指挥。将级军官都是弟兄班，各不相下，除了冯先生亲自指挥，谁也不服从谁。这次作战，因为冯先生下野出国了，指挥不统一，你打我不打，结果被对方各个击破，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

这一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三师人都连夜开拔，到五原去和冯玉祥会师去了。这三师人归附晋军以后，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现在突然开拔，阎锡山非常惊异。有人疑心这三师人是商震放走的，而商震则再三向我说，他并不知情。不过阎锡山也没有对商查究，反而做了个顺水人情，给冯玉祥拍了一个电报，大意是：

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既回国，他们自应仍由你指挥，等等。

(周玳口述 李大同 李宜琛整理)